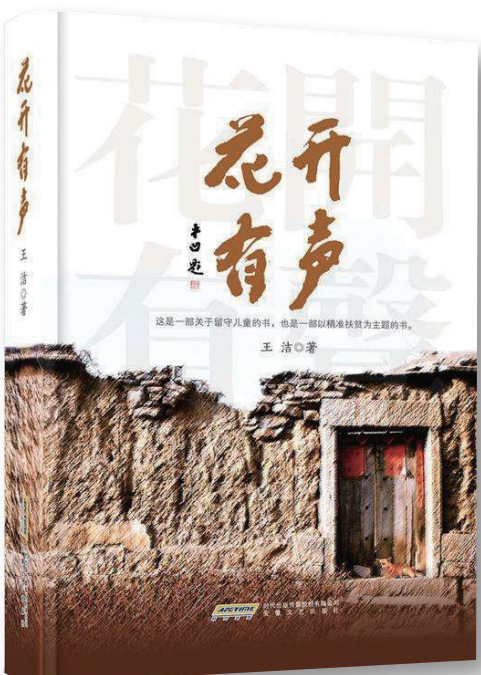


■ 聚焦

传统文化的湮没与人性复归

——浅评王洁长篇小说《花开有声》

□ 艾克拜尔·米吉提



这是一部看似轻松的小说,但读起来你便会发现它沉甸甸的分量。小说描写了苏州姑娘刘晓慧,大学毕业后在一个高端公司做白领,衣食无忧,生活安逸,收益丰厚,又有男友,应当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一次婚礼,她和老同学加“舍友”相遇,一年未见,她发现老同学变了很多,皮肤黝黑却充满活力,仿佛身上有着无限的力量。一问才知她大学毕业后便直接选择了去山区做一名支教老师。那一刻她才知道支教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需要关爱和应当得到公平教育的孩子。于是,她毅然决然告别了那种平静如水、一成不变、毫无生气的日子,独自踏上了到陕北李家坝中学支教的艰辛道路。

小说由此通过主人公刘晓慧的亲历,通过她的视线和感悟,向我们展开了贫困地区农村生活的一幕幕真实现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出现了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民工潮。人们从最初沉浸在争做“万元户”,到畅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喜悦,随着岁月的步伐,逐渐意识到暗藏的巨大隐患,那就是留守儿童问题。王洁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角度切入,直面现实,写出了千年土地的呻吟和一群留守儿童的残缺童年,他们的泪水、心酸、追求、梦想在书中皆有展现。其实,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与土地直接相连的。传统价值观就是建立在坚实的土地之上。在上世纪初,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后,“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试图扬弃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文化传统。后来虽然经历过“文革”,农民却没有离开过土地,因此,许多乡村文化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民工潮的出现猝不及防,几亿农民,几乎全是青壮年,离开土地进城谋生打工(包括到国外施工),他们便离开了土地,离开了那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这才是让我们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史一夜之间被割裂湮没(只剩下春节、元宵节等节日文化)的真实现状。长篇小说《花开有声》恰恰写出了被割裂的这一幕。不过,通过作品读者发现人心未泯,人性正在回归。父母养育后代,这是人的本分和天性使然,不能为了金钱去牺牲下一代的幸福。小说致力于揭开这一生活的真谛。

刘晓慧第一眼看到李家坝学校的学生,他们并非像城里初中生那样每一个个身着鲜艳整洁的校服,脸上洋溢着阳光欢乐的微笑,周身散发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站在她面前的孩子们个个衣着朴素,还有个别孩子只能用“衣衫褴褛”来形容。至于书包,也是千奇百怪,有的根本不能称为书包,只能说是个简单的旧布袋子,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补丁。稚嫩的脸上布满灰尘,一双双明亮却又充满忧郁的眼睛让人看

着心碎。虽然她心里早有准备,但当这一切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时,她还是有些惊讶,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胸口一般,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说不出的憋闷和难受。但孩子们的眼神是清澈的,如一汪清泉,这让刘晓慧多少有些欣慰,但更多的是心酸和无奈。

当刘晓慧从学生张承峰那怯生生的眼神和破旧的衣服开始探寻根源时,问题的症结便逐渐展现在她和读者面前。正如小文娟所说:“在我们班里,张承峰应该算是最郁闷的了……我跟文君的爸妈虽然都在外地工作,但他们至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陪伴在我们身边,而他永远都不会再有父母陪伴了。”是的,“他爸爸过世了,他妈妈改嫁了,他妈妈从来没有在过年的时候回来陪伴过他和他弟弟。”张承峰的爸爸,就是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在工地事故中去世的。自此村外的“望夫石”一度成为他的“望父石”,幼小的张承峰总觉得他爸爸还活着,还可以顺着那条路回来,而他的父亲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显然,离开了土地的人们,命运多舛,飘忽不定,甚至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挥之不去的痛楚。张承峰和弟弟张平峰现在只有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爷爷奶奶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依靠仅有的土地度日,还要带着两个孙子,几近赤贫的生活一下展现在刘晓慧面前。而在全班55个学生中,竟然有26个是留守儿童。这比例之高,出乎刘晓慧的意料。此前她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这么一大批群体不被人关注,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伤痕。想到这里,她暗下决心,以后要多多关注这些留守儿童。如果说,刘晓慧毅然决然选择到陕北支教或许是出于某种任性或一时冲动,那么从现在开始她已觉醒,她将她的支教、关爱与留守儿童衔接在一起。作品也由此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这片黄土地深处。

读者看到的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灵深处,由于常年缺失父母亲情和言传身教,所产生的失落感衍生为一种孤独、抵触,乃至隐隐露出敌视环境、敌视社会的端倪。张承峰、张平峰兄弟俩,自从失去父亲、缺失母爱之后,在心底已经开始积怨。当有一天母亲带着同母异父的妹妹来到家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敌意,让人心寒。天真无邪的心灵不该如此。作品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社会脉搏。尽管一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但是刘晓慧自觉地用身心温暖感化着这群留守儿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潜在的弥补和修复机制的内在链条之一。

外出打工获得财富的父母们的一厢情愿,并不为这些留守儿童所接受。比起丧父失母的张承峰兄弟,他的同学徐文君的家境应当说是完美的。但是,徐文君要的不是父母寄来的礼物,小说恰恰为读者揭示了这一点。徐文君在接到父母从国外寄回的礼物时,她内心是痛苦的。“她早就预料到会如此,但心里还期盼着,现在看到这些写满英文字母的东西,徐文君没有半分欢喜,反而觉得非常刺眼。它们好像在向她炫耀,它们又成功地把她爸爸妈妈留在了外国。”小说进一步揭示道:“此刻,她需要的不是礼物,而是父母,哪怕是父母的一个简单的微笑与拥抱”。被刘晓慧昵昵地称之为班上的“三朵小金花”之一的付文娟,每次听到从老远传来大巴车的喇叭声,眼睛就会死死地盯着大巴车,眼神里充满期待,她心里会想,爸妈会不会就在车里,是不是回家看她来了。当大巴驶过渐行渐远时,付文娟的眼神也由期盼变得失落。此时的刘晓慧在想,什么时候能让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心底,驱除她们内心所有的阴霾和忧愁,让他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成长?所以她对付文娟的妈妈说道:“爱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坦言:“文娟妈妈,但你要知道,作为老师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弥补和替代你们家长在孩子心中的位置啊!有时,真的需要在事业和孩子中间做出选择啊!”



刘晓慧家走访遍这些留守儿童的贫寒家庭,致力于给这些幼小心灵注入“知识是改变命运最有力的武器”的理念。刘晓慧感到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这群留守儿童与她小时候上学条件没法比,她以前认为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和她一样无忧无虑,从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生活贫困的孩子。当她走访傅圆圆时得知,这个学生的父母9年没回家了,也杳无音信,傅圆圆和她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她感慨自己以前受点委屈就会想不开,就会觉得不公平,今天看到傅圆圆这么小却这么懂事,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还不及一个10岁的小女孩。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刘晓慧的内心也在成长。她觉得自己在这一儿过得很快,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充实和满足。

她发动在新媒体工作的同学李雪,帮她在媒体呼吁,调动社会公益力量来帮扶这些贫困留守儿童。引来“蓝精灵”公益组织和董磊他们,为这些孩子们募捐到大量物资,送来书本、文具等学习物品和衣物,还有部分捐给学校的资金。刘晓慧也由此成为李家坝从建校到小学、初中合并后的号召募捐第一人,为学校立了大功。他们把这些学习用品送到了真正需要的留守儿童手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正如王校长所说,“我们不仅要心存感激,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他们的这份爱心,要时时刻刻心存感恩……长大成为有用的人,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回馈家乡,回馈社会。”

刘晓慧的温暖和善意得到了回报。付文娟终于参加合唱《我想有个家》。这不仅让付文娟战胜了心理障碍,而且也让班级获得了荣誉。对于付文娟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性格活跃起来。在春天的那片草地上,许萌萌不禁高喊:“喂!天空,我好喜欢你!”付文娟喊道:“喂!大地,我好喜欢你!”徐文君喊道:“喂!太阳,我好喜欢你!”许萌萌又喊道:“喂!小河,我好喜欢你!”付文娟又喊道:“喂!杨树,我好喜欢你!”徐文君又喊道:“喂!草地,我好喜欢你!”这饱含青春朝气的声音,从这草地上向外散发,引来路人羡慕的目光。瞧,喜欢自然,喜欢美,这就是人性的本真,在这3位留守儿童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回归。这正是刘晓慧老师所渴望见到的,也是她孜孜以求的真实变化。更为可喜的是,张承峰的学习成绩上来了,语文考了全班第二,连他顽皮的弟弟张平峰,也在刘晓慧的关心下成了一个好学生。那天,张承峰打扫完教室,欢快地回到家时,张平峰已经在家帮奶奶烧火煮饭了。他一边烧火,一边手拿着语文课本背诵课文。多么温馨的一幕。刘晓慧也得到了男友陈建海的信服和认同,放下在苏州的生活,和她一起来到李家坝学校,一同投入支教。相信刘晓慧和陈建海会在这里收获爱情,收获人生的更多可能。

在进入第一个百年之际,实现全面脱贫进入小康以后,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要敢于正视和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长篇小说《花开有声》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像刘晓慧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以忘我的奉献精神前往贫困地区支教,以自己火热的心温暖了那些留守儿童的心,让这些留守儿童能够敞开心扉,拨开云雾,告别痛苦,树立自信,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脱贫首先要脱去精神之贫困,这就是作品崭新的艺术价值所在。

在近期所有关于深圳奇迹的叙事中,采用报告文学文体还是不多见的方式。作为一种用文学手法来处理新闻事件的文学体裁,它在历史和读者的选择中,在优秀作家的不断开拓中,持续贡献着自己的独特价值。陈启文创作的《为什么是深圳》让人眼前一亮,是一部富有吸引力的报告文学佳作。

由于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加上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热点议题,各种总结深圳发展成就和成功经验的著作层出不穷。而人们也在对深圳故事不断的讲述和研究中,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及论断。例如:深圳经历了从边陲小镇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深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经历的质疑与掣肘,邓小平同志两次视察深圳奠定的一往无前的前进基调,深圳市政府对城市转型及科技创新的高瞻远瞩,等等。不过这些共识或结论大多数来自于对历史文献、新闻事件的梳理,或者聚焦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物的胆魄与视野,在具有历史俯瞰性和学术总结性的同时,也往往容易与普通读者产生“庙堂之高”的距离,虽然具有绝对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正确,却难以让处于深圳之外的“局外人”产生情感共鸣。

《为什么是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充分调动了报告文学的体裁优势,为“深圳故事”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框架和深描角度,既兼顾了俯瞰城市历史的浓缩性叙事线索,又着力开拓了面向个体生命的饱满情感张力。

在序章“为什么是深圳”这个总括性的开篇中,陈启文首先提出了他的追问——“深圳为什么是深圳”?与大多数深圳叙事的开端选择改革开放这一当代历史节点不同,陈启文将深圳的历史拉到了百越部族之一的南越先民,历经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南海郡,东晋时期的东官郡,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清代闭关名将、九龙海战指挥者赖恩爵的故事,挖掘出深圳如今依然存在的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的历史渊源。之所以怀有这种勾陈历史的“执念”,大概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座伟大的城市是有历史之根和文脉之根的。当然,深圳的精彩和高光时刻还是聚集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这40余年比起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自然是白驹过隙、沧海一粟,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绝不是平铺直叙的匀速运动,而是一浪高过一浪,不断自我超越的旅途。陈启文用三个小节——“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世界是平的”以及“撬动地球的杠杆”,选取了深圳城市跃进史上三个重要节点: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以WTO入世协定开启的“世界工厂”阶段,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下实现的创新型城市转型。陈启文以自己南下深圳的亲身经历,用精练而极富历史现场代人感的笔法,为深圳跌宕起伏的发展史注入了鲜活的个人经验。在肯定邓小平、习仲勋、袁庚等政治家和改革领袖的引领功绩的同时,也简略描摹了偷渡者罗先生、农民工锁链的生活片段,丰富了历史叙事的肌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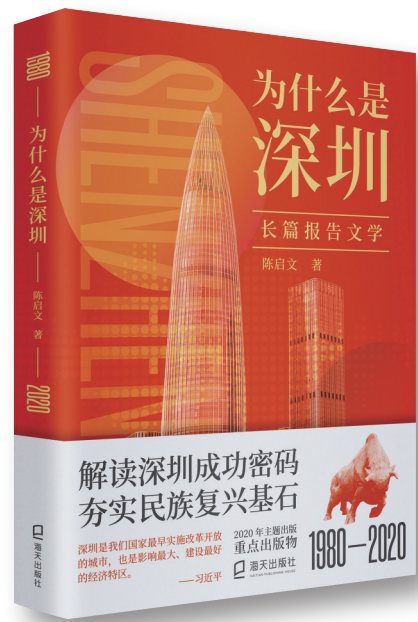
不过,全书最为宏大、最为浓墨重彩的篇幅还是企业家,特别是科技创业公司企业家从初创业走向世界之巅的奋斗故事。主体部分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分别锁定了任正非、马化腾、汪滔、陈宁四位创办华为、腾讯、大疆和云天励飞的创

深圳故事的别样书写

——评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为什么是深圳》 □袁园

业历程,并进行了极为细节化的深描。每一个章节都可以被看作一部独立的报告文学作品。合在一起,组成书的主体部分,又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深圳为什么是深圳”的解答。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最为主体的社会精英代表就是企业家,而能为深圳送上“中国硅谷”、“世界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名号,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便是那些将中国制造拉升至世界科创前沿,占据了核心技术、拥有行业话语权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在陈启文的笔下,这几位承载了民族荣耀的企业家,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圣人,他们要么从最简易的代理、组装机起步,要么从带有山寨嫌疑的即时通讯出发,要么从毕业设计失败颓废中重新站起,要么从一个民警的偶然闲聊中重新振奋……总之他们和千千万万在这座城市创业、打拼的“追梦人”一样,崛起于一个平凡而又看上去难以继起的微时。陈启文采用报告文学基于事实,却又可以用深入人物内心的文学笔法,将人物面临困难、考验、挫折和挑战时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作为叙事的主要角度,带领读者深入一个个位于不同历史现场的主人公内心,他们如何面对或压力重重、或危机四伏、或充满诱惑的当下?他们如何在一种可能中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选择?他们如何在深圳这块具有绝佳营商环境的沃土中获得资源、商机和协助?这些从个人成长角度出发的文学性心理还原,与纪实性的人城互融经历,不仅突出了这座城市价值取向、精神气质,更让普通人在这些突破万难的企业家“成长历险记”的故事中,体验到“看他起高楼”的繁华背后的万重艰辛,以及人生在奋斗的苦难中获得生命升华的本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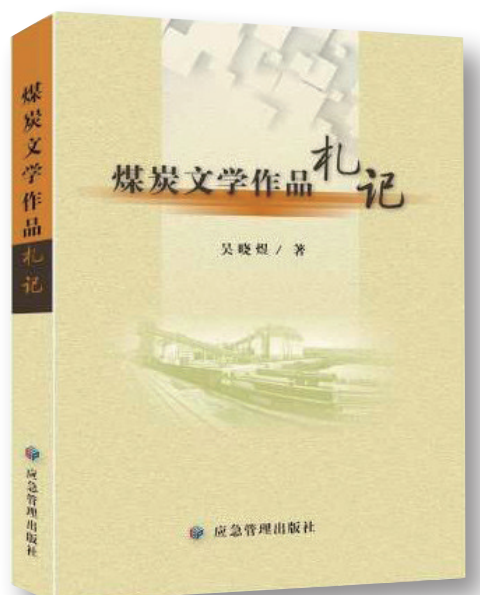
在当下成功学仍然盛行且以金钱获利为唯一标准的浮躁言论氛围中,在媒体杂志以创业为酷炫叙事的煽动情绪中,报告文学基于访谈、调查进行的文学创作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有利于在贴近生活驳斥真相的基础上为民族和人物“画心”。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是深圳》为一座城市的书写提供了既有历史骨架、又有血肉丰满叙事实践,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兼顾宏观知识理性和微观主体感性的深圳故事书写路径。



吴晓煜的《煤炭文学作品札记》,尽管以“札记”示人,但在我的眼里,这部书依然有着煤矿文学史的意义,它的出版或许填补了我国煤矿文学研究的空白。

我认识吴晓煜的时候,只知道他是煤矿文史大家。文史不分家,他因此也写过不少随笔札记和散文小品。他很早就对煤矿文学的作品和作家感兴趣。记得他告诉我他在张恨水研究会待过,就向我询问张恨水与煤矿的关系。我把张恨水写的一篇煤矿散文给了他,他立即写出《(煤矿)工人好——读张恨水西北行》的文章发表。后来他还出版了《夜耕村杂记》《学林漫笔》《欧非见闻录》等几部散文随笔集。没想到,很快他又捧出了一部厚厚的《煤炭文学作品札记》。

这部札记以20世纪60年代底为界。时间久远,煤炭文学作品及资料淹没在时间的尘埃里,他说搜集起来颇为“劳神费心”。逢人便问,到处寻访,掏钱购图。面对搜寻到的煤矿文学作品与资料,他又不泥旧说,爬梳剔抉。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分门别类,径自进行一些版本考证和研究,因此厘定中国第一首煤炭诗、第一篇煤矿小说,明朝煤矿散文和最早的煤矿报告文学,话剧与戏剧,给我们呈现了一条清晰的煤矿文学发展脉络。在这条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煤矿文学的产生、起源与发展,知道徐陵、岑参、苏轼、于谦、纪晓岚、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朱自清、路遥等名家与煤矿文学的关系。还有诸如“凿开混



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于谦)、“但愿苍生俱暖饱,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我年青的女郎”(郭沫若)、“请给我以火”(艾青)、“黑花便在梦里开满”(臧克家)这样的诗歌名句竟都出自煤矿。可见煤矿早就就是中国文学一块丰富而灿烂的宝藏。

煤炭有许多诗意的名字,如“香煤饼”“阴阳

听取新翻杨柳枝

——读吴晓煜《煤炭文学作品札记》 □徐迅

“炉中兽”“炭兽”“劫灰”“黑墨”“炭炭”“乌金”等等。煤炭首先就具有诗性及文学性。煤矿文学作为以题材为标准划分的一种类型文学,由于资料的缺乏,以前鲜有系统的煤矿文学史的研究。他的“札记”可谓首开先河,让我们重温南朝诗人徐陵的《春情》即煤矿诗歌或说是煤矿文学的滥觞。从《春情》的“奇香分细雾,石炭捣轻纨”诗句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煤炭那浓浓的诗意,还得知早在千四五百年前,中国就能把煤制成发香的煤饼。从那时开始,煤矿诗歌创作便有传承,经久不衰。直至新中国成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一度出现了火热的煤矿创作场面。郭小川、唐祈、冯至、张志民、臧克家、雁翼这样的诗人曾参与其中,写下大量煤矿诗歌。有关方面也组织编辑过《矿工诗歌选》《中国当代煤炭诗选》等诗集。

相对于煤矿的诗歌创作,煤矿的散文创作变化不大。除明代张仙《开煤洞记》,清代孙廷铨《石炭》、胡恩燮《煤说》之外,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冰心、沈从文、梁实秋、郑振铎、黄秋耘这样

一些作家写煤矿题材的散文。但这些散文也都是观感一类,没有形成煤矿散文的创作体系。只是到了当代,煤矿散文创作才稍有起色。而煤矿小说却保持了与煤矿诗歌一样的创作劲头。在《札记》里,吴晓煜考证第一篇煤矿题材的小说是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龙飞相公》,到乾隆年间又有《解己囊周惠全邑,受人托信著四方》短篇小说问世。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更有《矿山祭》(龚冰庐)、《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沈从文)、《掘金记》(毕焕宇)、《卸煤台下》(路翎)、《煤》(李纳)、《黑石坡窑演义》(康濯)、《五月的矿山》(萧军)这样一批煤矿题材小说出现……比照当下的煤矿文学,我认为煤矿小说有着一从蒲松龄开始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

煤矿的文学史,同时也是煤炭开采和矿工命运史。从《煤炭文学作品札记》里,可以看出煤矿文学首先关注的就是矿工的命运。古典诗歌对煤炭开采、生产到运输各环节,几乎都有表现,对采煤工人的悲惨遭遇的描述更为明显和直接。如

“尽爱炉中兽,谁怜窑下人”(刘克庄)、“千村土铤炊烟出,中有民命如丝悬”(钮琇《采煤曲》)、“京师徒炊百万户,谁人知道采煤苦”(祝维岳《煤黑子叹》)、“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内心烦恼忧”(徐继畲《驮炭道》)“生埋独何辜,一崩百夫阙”(姚椿《哀山中采煤者》)等。也只有到了新中国,煤矿诗歌创作才一改过去“哀鸣”“吟叹”之风,诞生出大量歌颂劳动、讴歌时代的作品,让人精神振奋。当代诗人刘看到煤矿普通劳动者写诗,曾说“煤矿诗歌的势力是茁壮的,方兴未艾;它本身,正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令人欣慰”。而煤矿小说创作,如果说早期尚停留在行善好义,因果报应的题目上,那么到了现代便变得恢弘浩繁、意义纷呈,既有像巴金《雪》那样“一边是猜拳赌酒的声音和笑闹声响成一片”,另一边是窑工们“活埋在里面(矿井),嗅煤气,挖煤块”的两个不同世界的煤矿生活的揭露,也有如李纳《煤》那样,有着“格调清新,洋溢着新社会温暖气息的作品”(刘梦溪语)。

“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过这样一首《竹枝词》。白居易是一位对民生疾苦有深刻悲悯的诗人,他写的《卖炭翁》尽管不是煤炭诗,但他那“歌诗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并不过时——对于煤矿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听一些“古歌旧曲”,然后新翻杨柳枝——何况这一支“杨柳枝”,吴晓煜已经妥妥地伸在我们面前。